



暨南大学中文系“国家文科基地”系列论著

主体的塑造与变迁

——中国知青文学新论(1977-1995年)

姚新勇◎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暨南大学中文系“国家文科基地”系列论著●

主体的塑造与变迁

——中国知青文学新论（1977～1995年）

姚新勇 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主体的塑造与变迁——中国知青文学新论(1977~1995年)/
姚新勇著.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2000.3
(暨南大学中文系“国家文科基地”系列论著)
ISBN 7-81029-889-5

I. 主… II. 姚…

III. 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文学创作—文学研究—1977~1995

IV. I 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73933 号

主体的塑造与变迁

姚新勇 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暨南大学出版社照排中心排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湛江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2000年3月第1版 2000年3月第1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625

字数: 200千 印数: 1—2000册

定价: 13.50元

“知青文学”的细读与别解

——序姚新勇《主体的塑造与变迁》

丁 帆

在姚新勇的博士论文答辩会上，我很想阐释和叩问的一个问题是：“知青文学”全部的历史意义在哪里？

但是，这个问题却是一个十分难以作价值评判的二难命题，究其原因，我反思了很久，终于找到了其中奥秘：作为一种历史的和美学的价值判断，我们这一代亲历过“知青”生活的人，是很难“走出历史的雾霭”的。我们在回眸和研究这段历史时，很难平静地抹去强烈的主体性介入，因为那段生活于我们这一代“知青”来说是刻骨铭心的，它使我们真正地认识到了中国最底层的黑暗和苦难。由此，我们在承继“五四”启蒙话语传统时，才有了更深的切身体验，才能在“地之子：乡村小说与农民文化”中找到自己言说的位置。

我们这一代“知青”身份（不管是显在的还是隐形的）的文学批评者是不能自己的。因此，当我读到董之林的《走出历史的雾霭》和赵园的《地之子：乡村小说与农民文化》等专著时，就有一种强烈的亲近感。并在与她们的多次交谈中，获得了一种心心相印的理论共识。

然而，不可逆转的历史，以及时代发展为新一代学者所提

供的宽阔的思维疆域，往往会将文学的研究推向一个更高的层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姚新勇是一个十分幸运的理论言说者，他可以跳出这一代人的思域，将他们的言说及言说方式作为一种参照，创造出一种全新的认知和认知方式。因而，当我们在阅读这本“知青文学”专著时，获得的是一种全新的感受。

正因为姚新勇认为以往的此类专著过分地强调了“个体的自我”，所以才将其理论的逻辑起点放在了对此形式的重新解构：“这些看似客观的共识，掩盖了特定的‘知青’群体意识与意识形态观念体系间的复杂关系，很可能掩盖了这种具有独特性的群体性主体是意识形态体系无意识的塑造物；同时也掩盖了这些对‘知青’和‘知青文学’的认识，也正从属并服务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实质。”（该书《导言》）在姚新勇那里，镜像的“主体”是“个体意识”一对矛盾辩证的逻辑关系：“就意识形态表象体系的无意识存在而言，它是无处不在的，是渗透于社会各个系统、各个环节之中的，个体无时无刻不存在于它的无形包围中，被其塑造，并呈现为它的具体的个体—主体的存在。”这个由“统治思想占统治地位”演变而来的普通辩证唯物论的常识，往往是被人们所忽略的问题。而正是抓住了这样的逻辑起点，姚新勇在这一次的“历史回访中”，就有了一种共时的“还原性”和“批判性”：“那种黑格尔兼启蒙哲学意义上的主体性存在，不仅不能作为前提—结果式对象，先在地约定我的考察视野，相反它将成为我的历史考察的解构体，将被我还原到造成其生成蜕变的具体意识形态生成史的考察中；我不仅将通过对历史的还原揭示多种‘知青’意识的存在来‘证伪’它的同质性，更要揭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多种思想观念的角逐中，它是如何被选择出来，充当了一种历史

的‘大写主体’，发挥积极的和消极的意识形态功能。”（引文同上）由此而来重新考察“老三届”文化现象，勾画出“知青文学”作为“无意识机制的‘工作’史”的进程，既成为姚新勇的理论识见，又成为他的一种独特的考察方式。

本书以其严谨的逻辑论证而显示其论者的学术理论功底。然而，我以为它和当下许许多多“砖著”是略有不同的。因为时下许多文学史的专著往往建构在一种庞大的理论体系之中，且这些理论体系多半是“进口货”，而真正触及到对文本，对具体的作家作品的分析和体悟，却难以避免捉襟见肘的“怯”来，给人一种空疏而缺乏实在的感觉。就此而言，姚新勇的“细读”功夫却显示出了他那种戒躁戒虚的严谨学术风格来。这也是此书高人一筹之处。大量翔实的史料性文本的阅读，包括那些旁枝逸出的背景资料的阅读，以及“文革”时期的“知青文学”的文本钩沉，都显示出论者的那份耐心和细致，从中，我看到了年轻一代学人中那种继承传统正派学风的精神。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姚新勇仍然是现时代的一个年轻的“文化保守主义”知识分子。在阅读此书的整个过程中，我分明看到的是激情写作的面影。“发挥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作为一种潜在的写作意识，已然贯穿于此书之中，我十分欣慰地看到，在一片传统文化与五四文化以及“后现代”文化的大混战的废墟上，居然还能站立起一代更为清醒的文化斗士，居然还能用一种崭新的“文化抵抗”姿态来解构诟病中国世纪末的文化弊端；以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意志来完成对文学史筛选的庄严承诺。我以为，这对于一个年轻学者来说，是尤为重要的，尤其是他目前处于那个相对而言商品文化语境更为发达的地区，能保持这种文化品格和人格操守，确是不容易的。

尽管此书中的有些观点我尚不能苟同，但作为对比自己晚

一代的学人，我能充分理解他们对“知青文学”的那份“冷观”与“局外人”的眼光。也许，正是由于这份冷峻的历史叙述，才能使我们这一代人思考一些更深刻的问题，在寻找“失踪的思想者”的路途中深刻地反省自己。

与姚新勇接触不多，他在南大攻博期间，从直觉上认为他是一个诚实敬业的学生，他师从许志英先生，每每有新论迭出的文章发表，都不忘送我一份，作为专业的行政上的负责人，在评定其每年的学业时，都毫不犹豫地给他打上了“优”。几年过去了，知他仍在努力。我以为，姚新勇作为学术上的新锐，须得摆脱各种非学术文化氛围的困扰，方才能够进入更高的层次。但愿在他的学术成长中少一点非学术的诱惑，因为这种诱惑是致命的。

是为序。

1999年12月2日于紫金山下

目录

“知青文学”的细读与别解·····	丁帆 (1)
-------------------	--------

导言·····	(1)
---------	-----

第一章 从众人政治意识的躯壳到知青主体类型的诞生 ·····	(11)
-----------------------------------	------

一 多功能性符号存在与独特知青身份的雏形 ·····	(12)
二 主体的问世与经典文本的成型 ·····	(34)
三 知青主体转型的社会结构原因 ·····	(58)

第二章 离散的历程：知青文学分类考 ·····	(75)
-------------------------	------

一 起点与框架 ·····	(75)
二 理想、献身、反叛、占有——知青英雄谱系探索 ·····	(81)
三 自疑、自疏、解构 ·····	(95)
四 文化乡村的不归之旅：从梦中家园到尴尬异乡 ——文化谱系探索 ·····	(104)
五 欲望与生命本体的探索 ·····	(114)
六 以管窥豹：《血色黄昏》及其他 ·····	(120)

第三章 从“知青”到“老三届”——主体向世俗符号的 蜕变·····	(131)
--------------------------------------	-------

一 “老三届文化现象”扫描·····	(131)
--------------------	-------

二	“老三届文化现象”与知青话语	(136)
第四章	落日情节的漂浮与戏谑智性的敞开	(161)
一	落日情节的漂浮	(162)
二	“黄金时代”的重写与敞开	(174)
跋		(195)
附录一	1977~1989 年知青题材作品统计	(210)
附录二	知青作品及相关评论文章目录	(212)
后 记		(263)

导 言

对于很多人来说，历史研究（包括文学史研究在内）就是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契入对象，从而达到对对象本质的把握。这实质上意味着对象是已定的、客观存在的，就等着某一研究主体去研究它、刺穿它、解释它。然而实际上这种“纯粹”的外在客观历史对象根本就不存在，我们所“面对”的历史，既是前人多种实践的遗迹，也是经过前人选择、加工、理解、解释过的历史，同时也是我们身其中的历史。如果对我们同历史的这三重关系没有一个清醒的意识，就根本不可能达到对历史较为正确的认识。因为当一个人盲目而自信地投入到对所谓“客观”历史的研究时，一方面就有可能陷入了已经过他人选择过的历史而不自知；另一方面也陷入了已被历史前定的意识形态的局限而不晓。其实这也就意味着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他就不具备对自己当下历史位置的意识。既如此，怎么可能展开历史研究者同历史的对话呢？既然无法展开这种对话，我们怎么可能从历史对研究者主体的前定制约或主体对历史的主观评断（这两者其实是同一性质的错误）的陷阱中跳出（在相对的意义而言），而达到对新的历史视野的开拓呢？所以具体到“知青”文学的考察，首要的问题是，要考察的真正对象是什么？为了确定它，首先要厘清我所面临的历史现象——“知青”文学已经以什么样的方式被呈现了。

概要的回答是，它已被呈现为“代际”主体意识的存在。也即“知青”文学已被视为独特的一代作家所创作的，表现了独特一代人的人生经历和思想意识的文学现象。尽管这一代人的意识及其文学表现是与社会历史原因紧密不可分，但它是一代人特殊意识的呈现则似乎是不容置疑的。

当然这并不是什么秘密，而是被人们普遍接受并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历史“事实”。例如，20世纪80年代研究“知青”文学的代表人物郭小东的一系列“知青”文学专论，就是建立在这个前提上的。1991年问世的董之林的“知青”文学研究专著——《走出历史的雾霭》，也是从一代人“心史”的角度来界定和考察“知青”文学的。尽管她不像郭小东那样执意强调“知青”代际意识的共同性，而更重视多侧面性。另外，赵园在《地之子：乡村小说与农民文化》一书中，虽指出了“知青”的代际角色与这一代人的自我营造有关，但她并没有以“营造”二字为历史考察的起点，去反观“知青”文学和“知青”一代的代际角色生成史的具体联系，而仍然以代际性的指认为前提，去考察“知青”文学诸方面的特点。这些来自各方面的观点共同指认着一个跨时代性的社会—文学的集体主体“知青”的客观真实存在。^①然而这些看似客观的共识，掩盖了特定的“知青”群体意识与意识形态体系间的复杂关系，也很可能掩盖了这种具有独特性的群体性主体是意识形态体系无意识的塑造物；同时也掩盖了这些对“知青”和“知青文学”的认识，也正从属并服务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实质。

当代哲学、精神分析学和社会学早已从多方面论证了主体的非客观性。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再生产理论就分析了“主体”的重要功能作用，即它将作为表象体系的意识形态体系与具体个体相连接的作用。意识形态表象体系为具体个体

塑造出某种特殊的“**主体**”类型（阿尔都塞把它称为大写主体，中文用黑体字标示）来为具体个体提供一个“镜像”，而具体个体则通过对这个镜像**主体**的体认发现自我，从而发现作为自我个体的主体性，通过对这个**主体**的自我内在化，将伴随着这个**主体**而在的一系列社会规范、价值准则、伦理要求等内化为自我主体的规约，并从而按照这一内化了的主体的角色规约，建立起我与他人、与社会的想象性关系，并按其规约性去从事社会生活实践，在这些社会实践中维持意识形态体系的存在。换一种方式说就是，意识形态体系为个体制造出一个似乎是属于个体的**主体**类型。它并不以其特殊的意识，去直接地、强行地剥夺每一个具体“主体”的“个体意识”，相反，它使个体将这类**主体**意识信奉为自己的意识，视为“他自愿接受的理念。这个主体一定会‘按照他的观念行动’，因而一定会在他的物质的实践活动中作为一个自由的主体来标铭自己的观念”。^②就意识形态表象体系的无意识存在而言，它是无处不在的，是渗透于社会各个系统、各个环节之中的，个体无时无刻不存在于它的无形包围中，被其塑造，并呈现为它的具体的个体—主体的存在。

以上述观点来看，由“知青”文学呈现出的，并被社会指认的“知青”文学的群体意识和群体特征，就是那种提供给每个“知青”个体（也包括其他个体）去体认、去认同的“**主体**类型”^③。它既不可能简单地由具体“知青”个体的意识汇聚而成，也不可能是一些或全体“知青”在社会变动的促动下的群体性创造；它既不能由社会政治形势的重大变动直接产生，也不可能随着社会的变动而必然形成。尽管这一切都在这个类主体的产生与衍变中起着各自不同的作用。它只能是从属于统治阶级的包含多样性成分的意识形态表象体系的制造物，它的

出现既是多种意识形态交互作用的产物，同时又是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借文学这一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归化主体的结果；它既以其社会存在性为社会生产和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招募着具体的主体，同时又通过具体主体对它的指认而得以维持。

由此，现在普遍被人们承认为客观存在的群体性“知青”意识，或表现了这种群体性意识的“知青”文学，就不再能作为考察的前提——结果式的对象，引导着我们进一步去完满地发现并描述与其相关的意识表现形态和文学表现形态，并进而去揭示它们产生的主体精神的和社会、政治、文化等历史的原因；或进一步对其进行一些批判性的价值判断。这一切工作会多多少少地包含并吸收于我下面对“知青”文学的考察中。但根本的是我所面临的对象和所欲回答的基本问题已发生了重大变化。那种黑格尔兼启蒙哲学意义上的主体性存在，不仅不能作为前提——结果式对象，先在地约定我的考察视野，相反它将成为我的历史考察的解构体，将被我还原到造成其生成蜕变的具体意识形态生成史的考察中；我不仅将通过对历史的还原揭示多种“知青”意识的存在来“证伪”它的同质性，更要揭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多种思想观念的角逐中，它是如何被选择出来充当了一种历史的“大写主体”，发挥积极的和消极的意识形态功能。

这样我对“知青”文学的考察，就具有了还原性和批判性的共时性要求。批判性指向对意识形态的揭蔽，为历史的还原提供动力和矢向；而还原则以对意识形态的具体揭蔽来实现批判的意识，使批判成为历史的批判。这也就是说，还原并不意味着以往的历史现象都是虚假的，我可以回到一种原初的未经玷污的真实的过去之中。这根本不可能。它只是指清醒地意识到我所要考察的文学现象，是已经过社会意识形态选择过了

的、并在根本上是社会意识形态观念体系的产物，所以我必须去重读历史，重读“新时期”“知青”文学文本，去发现在这近 20 年的“知青”文学历史中，什么东西被呈现了，什么东西被遮蔽了，被呈现、被遮蔽的社会历史结构原因是什么。一句话，我想还原的是表现在“知青”文学这个范畴之内的各种不同的意识，怎样在意识形态表象体系的无意识策动下，相互进行角逐的“运动”轨迹。

如此说来，“知青”文学就不是我的历史考察的内在对象，只是所要考察的现象域。那么这个现象边界的确定就必然要受到我的基本考察指向的制约。首先是时间边界的确定。考察时段大致是从粉碎“四人帮”一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止。其起点要比一般“知青”文学考察的起点《伤痕》（《文汇报》1978 年 8 月 11 日）约早两年；结束点则又跨入到了所谓的“后新时期”阶段，而作为一种代际性的、接近于流派性的“知青”文学创作现象，最迟也早已在 1987 年左右就结束了。我之所以选择这样的时间段，从现象上说，是关注到了被人们忽略了的一段历史，即从粉碎“四人帮”到“伤痕文学”兴起的这段“知青”文学状况；关注到了由于时间差的原因还未被来得及考察或被忽视了 20 世纪 90 年代“老三届”文化现象。从理论逻辑上来说，正是这种似乎是跨历史分期^①的考察，才能够比较完整地勾画包含在“知青”文学这个领域中的意识形态体系的无意识机制的“工作”史。

其次是具体考察材料的来源。一、我所选取的基本文字材料，都源自公开正式出版物。这也就是说我是在社会公众普遍可接触到的显性存在的层面上来考察“知青”文学的。固然这些显性层面的东西，本身并不能包括所有的“知青”文学材料和“知青”文学现象（如“文革”时期的地下文学），但它无

疑是与我的考察视野直接相关、基本相符的。不错，我当然不会把考察的视野仅限于此，但我的任务决定了只能把这些公开出版发行物当作基本材料的来源。二、我所选择的这些公开刊物大约由两个部分构成。主要部分是约 20 种文学期刊；另一部分是 20 世纪 90 年代出现的大量的“知青”或“老三届”回忆录以及其他相关文字材料。20 种文学期刊的确定，一是考虑到重点性（或曰主流性），如《收获》、《上海文学》等；二是结合当年知青上山下乡的分布情况以及主要“知青”作家的地理分布，选择了一些地方性的杂志，如《中国西部文学》、《草原》等。^⑤对这约 20 种文学期刊我采取卷地毯式排查法，将所有涉及“知青”题材的小说、报告文学挑选出来，进行考察。尽管这些杂志在意识形态方面是相对一体化的（尤其是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前），但它们所呈现的“知青”意识的纷杂性也足以动摇我们所熟悉了的“知青”文学发展史。三、有关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大批出现的“知青”或“老三届”的文字材料，在某种意义上溢出了比较“纯”的文学边界，更多地呈现为“老三届”文化现象的组成部分之一。这正好与 20 世纪 70 年代末、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的作为文化—文学现象合二为一的历史形成一种对照。

其三，是“知青”文学这一重要概念本身。“文学”现在已不再是一个不言自明的概念，各种理论对什么是文学、什么算文学都有不同的看法，不过我不准备介入这些争论，我基本上是按照现实约定俗成的划分来使用这一概念的。至于说这里的文学为什么基本只包括小说、回忆录、报告文学，而几乎不直接接触及电影、诗歌等，这既是按照现在人们谈论知青文学的一般性所指来划定的，也更是以我的内在考察指向和自己的知识范围来决定的。以上一切都好说，问题是“知青”这一关

关键词语，它并不像通常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就是“知识青年”这一称谓的缩略语，它无论是作为社会学群体的指称，作为某一单个人的身份指认，还是作为某种文学现象或社会运动现象的限定语，其内涵都是很复杂的。就是仅把至限定在我所要考察的文学范围，其主要内涵也早已被意识形态所染色。这样一来，我似乎陷入了一种自设的困窘中：我既要对“知青”这个概念所蕴涵的代际主体性神话进行解构，还原它的意识形态史，又要以此概念来给所欲考察的作品划界——如果不以此概念来划界，我欲考察的现象域将不复存在；可是若以此划界，我将如何避免已存概念内涵的约束，在尽可能大的程度上还原历史，而又不将历史还原为已存历史（这正是我欲超越的）或还原为一团历史的乱麻呢？（正是因为意识到这一矛盾，所以行文至此我一直在“知青”二字上加了引号）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我在考察的起点就只取“知青”这一概念最一般的社会学身份性含义，即它是指那些在“文革”开始后上山下乡的城镇青年。^⑥它在我选定作品时，只具有抽象的指涉性功能，而与其它相关的写进文学作品中的、人和所呈现的思想、观念、意识的具体内涵，则由所考察的历史去赋予、去呈现。而这正好符合我的历史考察的目的性指向。（尽管难免考察者的历史偏见）这样我所涉及的知青文学范围，就包括所有材料来源中的涉及知青题材的作品，而不管作者是否曾是知青。具体而言，它们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是那些以知青插队或兵团生活为题材的作品，作品主人公一般就是知青，或是重要的配角式人物；第二类作品主要人物是知青，但所描写的生活并不局限于乡村或兵团，而是涉及到城乡生活的交叉，过去和现实的意识不断切换的作品；第三类是主人公曾有过知青经历，但描写的生活已基本是回城后的，不过知青生活经历仍然作为

一种重要背景，影响着主人公的现实命运和思想观念；第四类主人公或重要配角或观照对象或曾是知青，但其描写的意向所指不拘泥于再现知青生活或知青历史，而是与其他意旨结合起来写；第五类知青已不充当主人公，关注的重点是在其他社会范围上，但故事讲述者则是知青，带有特定的知青视角，讲述者在作品中出现。前三类作品当然包括像《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雪城》、《金牧场》这样典型的知青作品，但也包括通常不被看作是知青小说的作品，如《蓝蓝的木兰溪》，还包括看成是“文革”式知青文学而被忽略的，如《高高的红石崖》。第五类作品的范围最狭窄，主要就是朱晓平“桑树坪”系列中的几篇，还有陶正的《女子们——〈田园交响诗〉之一》这类作品。最复杂的是第四类，下列作品都应该划入其间：《岗上的世纪》，阿城的“三王”，李锐的“厚土”系列，《海边有一个世界》、《错误》、《黑夜·森林·傻青》，《落日情节》、《英雄》等。我大致划出这样五类。无疑这只是一一种不很确切的归类，它们中的很多作品完全可能被另外的研究视角归入其他的分类中。而且这五类包容性相当宽泛的划分，在某种意义上又是局限性很大的。它不仅排除了《爸爸爸》这类离知青题材作品很远的知青作家的作品，而且也割舍了《黑骏马》这样的就是知青人物稍微变换了外部身份特征的作品，如果不这样现象域的扩展就会超出我的把握能力。不过虽然如此，在必要的时候，我还会将有关作品引入我的视野。

现在该来交待本书的章节构成了。本书共分四章。第一章重点考察粉碎“四人帮”到1982年左右的知青文学状况。它将具体揭示知青如何从“文革”型的知青一小将主体类型，经由暧昧的众人政治意识的躯壳，最后演化出新的独特的知青主体类型。这一章的考察将填补现有知青文学研究的一段历史空